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瑾

## 法国《新团结报》总编辑： 美国炒作病毒溯源 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瑾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法国《新团结报》总编辑克里斯蒂娜·比埃尔撰写多篇重磅文章，向法国民众揭批美国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政治阴谋。

近日，比埃尔就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问题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独家专访。她在采访中痛批美国施压世卫组织背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并表示：“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她还披露，武汉P4实验室在酝酿之时起，就一直是美国的“眼中钉”。

## 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 攻击中国寻找借口

在谈到美国向世卫组织施压、要求就新冠病毒进行第二阶段溯源的真实动机时，比埃尔表示，美国此举与当年将萨达姆·侯赛因妖魔化并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出一辙。“美国此类动作的目的，无非都是恐吓自己想征服的国家，寻找借口攻击这些国家，并勾结自己的盟友伺机采取军事行动。”她说。

比埃尔认为，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美国对中国的攻击，“首先将是经济层面的”，美国会将中国指定为新冠病毒的源头，并要求中国赔偿经济损失。

位于英国伦敦的反华研究机构“亨利·杰克逊协会”曾妄称，中国需要赔偿3510亿英镑。比埃尔对此表示，如果中国拒绝经济赔偿，美国就会有军事行动的企图。

## 武汉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 已在全球范围传播

“如果要进行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那就必须要调查在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因为安全原因关闭的真实原因。”比埃尔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她认为，溯源工作需要在全球多地同时进行。“为防止大型传染病传播、研发相关疫苗，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在进行病毒研究，所以有必要在具有这一能力的所有国家展开调查。”

她指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都已在本地血液或者污水样本中发现了早于武汉疫情前的新冠病毒，“这可以证明，武汉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传播，武汉并非病毒的发源地。”

## 武汉实验室一直就是美国的 “眼中钉”

比埃尔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顾称，武汉P4实验室是中法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科学合作的优秀计划。早在希拉克总统时期，中法两国就进行接触并在2004年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建设P4实验室。

比埃尔说，与戴高乐将军一样，希拉克追求法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拒绝与美英阵营结盟。“然而，中法协议的运动未干，一场针对这个实验室的阴谋就已经展开。”

她引用法国媒体此前的公开报道称，这一合作遭到了国际多重势力的阻挡，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当时，围绕这一项目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资深科学家主张合作，以帮助中国提升应对大型传染病的能；而反对声音则担心中国将P4实验室用于制造细菌武器。

比埃尔在一篇题为《武汉P4实验室，盎格鲁—撒克逊眼中的“洪水猛兽”》的文章中称，该项目从最开始就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美国的反对并非从实验室安全角度出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中国与西方体制不同，不能允许中国有将其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

## 中美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

比埃尔在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时表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盛行，这是阻止美国有效抗击疫情的原因之一。

她说：“美国把个人政治自由与公共卫生安全混为一谈。大型传染病是对社会集体的威胁，为了战胜它，需要公民接受自己的某些权利暂时受到限制并遵循医务人员指导。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瓦解了美国为何无法战胜疫情，也解释了美国为何无法阻止贫困在该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与那些选择与病毒共存而导致抗疫失败的国家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证明了只有积极主动的抗疫战略才能取得成功。”比埃尔说，中国在动员一切抗疫资源和使用科技创新成果方面作出了典范：口罩、核酸检测、隔离、疫苗、5G、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应急医院建设等。“这一切让中国能够尽快排查、隔离、远程治疗，并让病人及时入院治疗。”

针对中国近期因境外输入而再次出现疫情的情况，比埃尔表示：“这证明，当中国说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应该听中国的。为战胜疫情，需要各国协调政策。”

（原载《中国青年报》2021年8月17日2版）

## 美学术刊物网站显示——

# 美国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工冠状病毒合成技术

■ 人民日报记者 张梦旭

美国学术刊物网站显示，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拉尔夫·巴里克，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技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国家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国际舆论呼吁，为提高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等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 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改造技术

巴里克目前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系和微生物与免疫学系教授、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是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介绍，巴里克主要研究三种RNA病毒，其中包括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冠状病毒。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巴里克以自身名义或者作为指导教师共发表400余篇论文，其中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文高达268篇。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制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美国《病毒学杂志》网站显示，2002年，巴里克领导团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依靠这套系统，科学家对病毒的研究可以在活体内进

行，通过改变病毒的基因或者结构，来了解每个基因在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时发挥的作用。这些工作极具突破性，它可以通过给病毒不断更换“组件”，从而制造出新的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SARS样冠状病毒。后来，巴里克等人就这一成果申请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

## 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2008年，巴里克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详细记录了设计、合成并激活一种SARS样冠状病毒的方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人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毛上皮细胞。“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了一项规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生命形态。”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中写道：“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到人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可能出现途径，我们设计了一个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一致的基因组，并将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替换为该基因组。这种新型嵌合病毒能够被蝙蝠和人体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效中和。”

2015年，巴里克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展开。这种经过基因操作的SARS冠状病毒更具传染性。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刊发

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2016年，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论文结论中表示，他们以SARS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制造出的嵌合病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出了可复制性。

2020年6月，巴里克做客美国“本周病毒学”播客，进一步阐述他的团队在自己的实验室“改造冠状病毒”的细节。他说：“改造新冠病毒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将至少四或五组不同的变异设定放入新冠病毒的受体结合域里去，使得新冠病毒可以和老鼠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

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有痕迹，但巴里克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2020年9月，巴里克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三台节目“普雷萨迪雷塔”（意为“直击热点”）采访时，当记者问道：“如果你不想留下痕迹，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个病毒，使其看上去与自然界的病毒没有区别，是吗？”他答道：“没错。你可以不留痕迹地进行合成，目前有四种合成冠状病毒的方法，利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不留痕迹地在实验室制造病毒。”

## 与德特里克堡关系非同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

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合作。巴里克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的“技术”，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德特里克堡内。

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SARS开展过科研合作。一篇2014年刊发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文，就来自与这两个德特里克堡机构的合作。2018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丽莎·托泽夫斯基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感染了猴子。美国军方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糟糕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下属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关闭。据《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

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所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

巴里克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生物实验室也有类似问题。据美国非营利新闻调查网站ProPublica报道，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教堂山分校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其中，2016年2月，一名实验室女性工作人员被感染SARS样冠状病毒的老鼠咬破了手指，但在接下来的10天里，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被隔离，而是被允许戴着外科口罩在公共场所活动。

非律宾《马尼拉时报》专栏作家毛罗·贾·萨蒙特日前发表题为“现在全世界都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文章说，一系列疑点已将病毒溯源的矛头对准德特里克堡，对其开放调查是病毒溯源问题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当我们看到有2000多万中国公民签名请愿，要求开放调查德特里克堡时，我想到，成千上万认为德特里克堡有疑问的非律宾人也应该有机会向世卫组织请愿。这是国际社会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

马来西亚《东盟邮报》近日发表文章说，一群非律宾记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网上发起请愿，敦促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正如请愿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德特里克堡仍然是一个不应被世卫组织专家忽视的谜。为提高透明度，世卫组织应对德特里克堡和全球其他类似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18日16版）

# 个人主义泛滥使美西方国家疫情雪上加霜

■ 田文林

当前，西方国家疫情难以控制，美国疫情更是出现加速蔓延态势。据报道，今年7月5日，全美有19%的人口生活在高风险地区，到8月9日这一比例已暴增至98%，也就是说98%的美国人在生活在疫情高风险环境。美国等西方国家医疗条件先进，但疫情却加速蔓延，除变种病毒传染力强、疫苗免疫效果不如预期等技术性原因外，个人主义泛滥是导致西方疫情防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 反智主义的社会根源

美西方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统治可谓无处不在，它不仅主宰经济、掌控政治，还直接参与社会价值观塑造。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成果基础上；从政治角度看，它建立在少数资产阶级统治多数劳动者之上。因此，资本的统治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为了维持非正义的经济剥削和阶级专政合理化，使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其价值观必然是颠倒黑白、混淆主次的反智主义。

在社会科学领域，反智主义刻意回避阶级分析法，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将矛头对准资本。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普遍很“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空洞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更道貌岸然。

在政治学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在价值观领域，以笃信宗教掩饰无客观规律和现代科学，导致谬种流传。民调显示，美国迄今仍有1/3的人不相信进化论。特朗普时期的副总统彭斯曾表示吸烟不会致癌，还否定进化论，认为地球生命及智慧都是上帝创造的。美国自建国后从未发生过

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大本营，首先是意识形态对立，同时基督教思想根深蒂固也是重要原因。基督教劝诚信徒要顺服上帝、靠上帝的祝福致富。而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唯物论和无神论等，对这些宗教信仰没有吸引力，甚至排斥。

为麻痹多数民众，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政界精英还提出“奶头乐”理论，主张为了20%的上层人士高枕无忧，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占人口80%的大众阶层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性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甚至低俗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了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想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用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鸦片一样，令人浑浑噩噩。

## 个人主义价值观迷惑性大、危害性强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从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体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以此确保资本力量对劳动者的压倒性地位。为了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新理论，将个人苦难合法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使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使之独自面对庞大的资本力量。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阻碍了劳动者

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相比于奴隶社会的强制劳动和封建社会的劳动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所谓“个人自由”，不过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不过是接受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因此，个人主义看似最关注个人福祉，实则是为资本扩张和增值服务，最终目的是将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行为合理化。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乃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其次，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最终导致“整体利益最小化”。长期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说过：“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个体男人和女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属性。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共鸣和体验。

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18世纪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认为，实现有序社会的关键是自利，而是找出驾驭自利的动源，并使之服务于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和方法。亚当·斯密曾说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路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继亚当·斯密之后，西尼尔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约翰·穆勒则将人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

“经济人”（理性人）假设是明确将个人界定为精于盘算、矢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抽象个体。“经济人”主要遵循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任何偏离自利原则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非理性”。这一假说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他

人，一切行动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且只有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时才会遵守社会公德。

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导致整个社会的评价标准日益颠倒和错乱。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贪得无厌的行为总是不招人喜爱，被人鄙弃。但随着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尤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人们对逐利行为后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个世纪前被社会唾弃的贪婪逐利行为被正当化，对财富的贪婪被视为人类再正常不过的合理诉求。恰恰是在这种“非道德化”过程中，资本力量日渐摆脱了社会道德的束缚，行为日趋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资本的反社会属性从涓涓细流变成滔天洪水。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的达尔文，事实上十分强调互助意识的重要性。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道德品质。他认为，“社会本能”的发展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依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鼓励人们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使人类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共同体倾向，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再次，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个人主义产生后，“人民”的概念不再是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历史与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美国是其中典型代表。美国本身是个移民国家，号称“合众国”，实则境

内各个族群、各国移民从未“合众为一”，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心理。美国大力宣扬的推崇竞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将整个社会变成“原子化”个人的集合体。“原子化”个人的副作用就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难以形成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民众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看似紧密相依，实则各不相容。

## 疫情暴露反智主义价值观的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典型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的杀伤范围不分国籍、种族、阶级。因此，应对疫情最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主义精神，以及朝野同心的集体主义精神。遗憾的是，面对疫情，西方政客不是向病毒专家和防疫专家求救解决之道，反而回避矛盾，到处甩锅，并乞灵于各种旁门左道。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力量长期推行惠民政策最终结出恶果。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多年浸淫下，许多西方民众执着于“个人至上”信条，对所谓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抱有执念。这使西方民众面对疫情时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由此极大延误了疫情防控。在这些人士看来，政府采取的种种限制性举措（如居家隔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是对个人权力的限制乃至侵犯。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时期，西方民众经常公然抗拒政府禁令，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举行抗议、集体聚会乃至开个人演唱会。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无疑加重了疫情蔓延态势。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缺失，才使西方民众很难像东亚国家那样，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没有比较发现不了真理。中国能够取得全世界羡慕的抗疫成果，与中国长期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直接相关。中国历来有“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更是大力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国民众能够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控举措（如封城、居家隔离、公共场所戴口罩等），使中国抗疫斗争真正成为有死无生的人民战和总体战，并最终确保了抗疫斗争的胜利。

（原载《光明日报》2021年8月18日12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